

北海文史

第五辑

陈济棠主粤时期 北海对外贸易短暂繁荣

李志俭

1929年至1936年，陈济棠管辖广东实行一些开放措施，发展地方经济。这种政策客观上刺激了当地的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，北海土货出口较有起色，1933年一度居全国沿海商埠第十位。尽管陈济棠的措施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失败了，但总结这段历史经验，对今天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坚持改革、开放、搞活的方针，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作用。

一、陈济棠发展商品经济的措施

1926年5月，广西防城人陈济棠(1890.2.12——1954.11.3)率领国民党第十一师接管北海。此后，他以钦廉为地盘，利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，凭借手中的军事力量，于1929年执掌了广东的军政大权，并和李宗仁成为西南各路军阀反蒋的盟主，省主席陈铭枢被迫出走。在当时朝野分治，以及蒋介石军队围剿工农红军和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环境下，他为了独霸南粤，维持其统治地位，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当地商品经济。在交通方面，他把整顿水运行业作为重点，因而成立广东省港务管理局，拟设江门、北海、九龙、拱北、三水、汕尾六个港务分局，统一管辖沿海港口。这个决策，可以利用广东毗邻港澳，水上运费低廉的优势，发展对外贸易，搞活地方的商品经济。与此同时，他组织扩建了广州经江门、阳江直通廉州、北海和钦州的公路，大力发展陆上运输。他还设立西南航空公司，建立北海飞机场。据旧海关档案资料记载：“本年广州、北海间航空业已开始飞行，中间经过茂名、琼州等处，因而本埠与各该处关系，乃益密切矣”。(1)

另外，陈济棠将蒋系控制的中央银行广东分行改组为广东省立银行，并在北海等地设支行，控制了金融市场。时值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世界性的经济危

机，他看准机会，一方面采取措施发展地方工业和商业，把大批国产货投入港澳市场；另一方面提高进口税，用关税壁垒来排斥和减少洋货进口，保障广东的地方产品投入国内外市场。同时，施行一种保护地方工业的法规，促使民族资本家注重发展实业。结果，地方的经济发展大有起色。钦廉、玉林一带，气候温暖，土地肥沃，农副产品极为丰富。由于陈济棠管辖的广东政府，鼓励土货出口贸易，故当地由北海港出口的水靛、糖、花生油、牛皮、桂皮、八角、生丝、烟叶、锰矿和猪、牛、“三鸟”等畜产品，以及尤鱼、墨鱼、大虾等海味，大量打进国际市场。其中，桂皮、八角每年出口几百万斤，经香港转销欧美。由于世界市场化学染料暂时短缺，以及食品价格逐渐昂贵，北海商家便注意加强对水靛、糖、生猪和海味等项产品的出口。随着纺织业的发展，水靛作为一种染料，销路极广，价格亦高。水靛主要产自合浦、玉林、博白一带，在香港市场上以质地优良闻名，每担售价白银十两，每年由北海出口数万担。

糖，是北海出口的传统大宗货物之一，产地主要在南流江和钦江沿岸一带。然而，当时糖在香港国际市场价格低廉。大批洋糖进口，大大冲击了国内市场，加上商家从中盘剥，农民种植甘蔗收入甚低，因此大大地挫伤了蔗农的积极性。所以，1929年以前北海出口糖只有二万至三万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陈济棠管辖的广东省政府通过进口货增加关税和纳捐，对出口货减税的办法，保障国产货在国内外市场的地位。例如，当时洋糖进口每担课税1.6元(银元)，另加纳捐8元，使其成本每担增加高达24元。结果，大大打击了洋糖对北海港的进口。1931年尚进口4,589担，次年马上降为142担。与此相反，北海港出口糖运往上海，每担课税只有1.6元(银元)左右，进口糖无法与之竞争。1933年，输出通商各口岸之赤糖，共有七万三千担。本埠转口贸易，因而放一异彩焉(2)。

同时，北海港亦是著名渔港，当地人约百分之三、四十以渔业为生。据北海有关资料记载，外商“缘以本港系渔类制品之区”，十分注意从事北海的水产品贸易。由此输出的海产品以尤鱼、墨鱼、鱼干、咸鱼和虾米为大宗，大部分输往香港，每年估值十八万两关平银。另外，生猪一项，亦是出口的传统贸易

产品。由于陈济棠管辖的广东省政府实行鼓励出口贸易的措施，北海生猪“向居出口货重要部分，因豢养较廉，而香港常取给于此。历年输出，有加无几”。

(3) 钦廉，玉林地区的粮食一般农户自给有余，加上谷物低贱，青饲料多，故农民养猪成本低，因而出售价格亦便宜。同时，农民收入来源相当部分靠养猪。卖猪得来的钱一方面交捐税，另一方面可换来衣物等生活用品。所以，几乎家家户户帮养猪，其中以公馆猪较为闻名。外商亦因有利可图，与北海华商合资，从事生猪出口的买卖。1919年北海输出生猪往香港只有3.4万头，1929年便升为5万多头。此外，桐油、锑、钛、锰矿等工业原料，也打入了国际市场。锰矿，也是北海出口的传统商品。广东省政府采取鼓励实业的措施，粤西的民族资本家便在钦州附近兴办裕钦公司，所出产的锰矿大部分出口往日本，每年约16万担。当时，粤西地区和桂南地区的土货出口，“皆系由本口转运出洋”。商家在北海投资，“获利尤厚”。结果，吸引大批中外商家抵此从事贸易。一方面推销煤油、棉花、针织品，另一方面在此组织糖、桂皮、八角、水靛和生猪等农副产品出口，由轮船运抵香港或上海中转欧美。因此，北海仍成为粤西主要对外贸易口岸。

二、北海对外贸易一时活跃

1930年，粤桂军阀为争夺势力范围，互相之间发生了战争。2月，桂军进攻北海。市民闻讯大惊，纷纷将纸币兑换银元，陈济棠设在北海的银行，无法应付金融风潮，暂停营业。因而，“市面所留无法兑现之纸币，为数甚多，商民受害匪浅”。(4)其结果，广东省政府发行的纸币成为一张废纸，北海商务大受影响。3月，广西独立第四军攻入北海，粤军便向今湛江方向撤退。桂军占领北海埠后，“曾令当地商会筹集款项，以充饷糈”，大大加重了商民的负担。4月，粤军加紧反攻，“广东政府下令封锁北海”，(5)桂军被迫退回南宁。北海虽遭战祸影响，但幸得时间极短，没有遭到很大破坏。7月，西江沿岸一带，桂粤军阀重开战，社会治安更紊乱。据海关资料记载：“南宁与梧州之间交通，自岁首旬日后，即以战事关系完全断绝，商业亦因而停顿。……7至9月间，南宁为滇

军包围，所有海关人员。迫不得已，暂行离埠，以避战祸” 故南宁经梧州出口的货物，“现多改由北海运输”。(6)

南宁是广西省会，亦是岭南重镇。东有梧州，“适扼西江”。西南有龙州，境接越南，地理位置十分优越。然而，自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开埠通商以来，直接对外贸易仍无起色。从1922至1929年，它的对外贸易总值只有2831万两关平银，仅占北海对外贸易的89%。其原因，一是北海至南宁铁路尚未修筑，影响了货运量的增大；二是梧州至南宁，相距约500公里，主要靠西江运输，“若在浅水时期，上行电船，须二、三星期始能抵达，行旅之苦，概可想见”对此，南宁关税务司亦承认：“本埠出海无路，难望振兴”。尽管南宁出海不方便，但由于从香港水路由轮船运货经北海抵南宁，比从香港由小电船经梧州抵南宁较为便捷，运费亦省。所以，南宁进口的货物，主要取道北海。此时，陈济棠已成为西南军阀的盟主。他为了独霸南粤，拥兵自重，与蒋介石分庭抗礼，维持其官僚机构和一支庞大的军队，每月开支达420万元，耗费巨大。由于缺乏来源，每字赤字70万元(粤币)。而世界性经济危机此时又对广东地方经济冲击甚大，这迫促陈济棠不得不立意兴办实业，采取一些开放措施，发展对外贸易，以开辟财源。首先，他颁布新的税收法令，对洋货进口，课以莺税，学加45%的附加税；相反，对土货出口则实行优惠税以保护地方经济的发展。结果，北海埠“商务状况，一时顿为活跃”。

1930年，由于外国化学工业的发展，外商对北海出口的水靛的需求大大减少，而对食品工业和轻工业产品原料的需求却迅速增加。外商因供求关系发生变化，只好提高收购价格。北海商家抓住市场行情，大量出口生猪，桂皮和海味等土货往香港，“皆得善价而沽”(7)商人见实行优惠税，有利可图，对出口货源抓得很紧，尤以生猪、家禽出口创汇最多。1930年北海出口生猪5万多头，创汇60多万两关平银，约占全国生猪出口的五分之二。另外，北海所产尤鱼、虾米、墨鱼、咸鱼出口往香港，销路极旺，创汇极高。对此，北海关档案资料亦记载，“渔业大见发达，出口海产之估值，为数甚巨”。(8)

由于陈济棠管辖的广东省政府采取一些开放措施，客观上刺激了农副产品的商品化，反过来促进当地对外贸易的增长。1930年，北海洋货进口由去年的149万元升为210万元(洋银)，只增加40%；而国产货进口由去年的111万元升为246万元，却增加120%。这反映出国产货在北海市场已占优势。北海港的土货出口则由去年的162万元升为231万元，增加42%。“出口货中之八角油、花生油、纸张等项，增加颇巨，锰矿砂运往外埠之数(以运日本者居多)，上年为九万七百三十担，本年增至二十万七千一百一十六担”。(9)在北海对外贸易货种中，以锰矿增长的速度最快。1930年，北海关的税收由去年的18万元，升为31万元，增长72%。税收的增长，意味着陈济棠地方政府的财政好转。

三、北海土货出口一度居全国沿海商埠重要地位

1931年5月，“粤省宣布独立，与南京政府对峙，人心犬震”。(10)为了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与蒋对抗，陈济棠费尽心机，筹集经费，不惜提高税率。1932年初，广东省政府对远离广州的北海，斤斤计较，下令对海产品增加捐税。结果，“北海地方，因商民反对省政府徵收海产捐，酿成罢市风潮，商务大受影响”。(11)广东省政府始觉不妥，改实行薄税多收政策。由于社会动荡，人心不安，商家一度采取观望态度，故1932年北海对外贸易总值只有771万银元，比上年增加15%。可是，北海关的税收却由去年的32万元，升为59万元，增长84%。由此反映出，陈济棠时期北海税收增长的速度是惊人的。

1933年，北海产品在香港国际市场颇享声誉，贸易额增大很快。其中，生猪出口达6万多头。其价格当时每百斤约值港币18元，平均每头生猪可卖得港币30至40元。对此，海关资料亦记载：“至于出口贸易，因汇价优异，故形活跃。本年输出之猪、家禽、八角、花生油等货，以视去岁，无不增益”。(12)由北海出口的土货，大部分输往香港和越南海防，亦有一小部分输往广州、上海、天津等处。从1932年至1936年短短的五年时间里，北海土货出口总值达2051万元。抗战前，北海土货价格十分低贱。每担(一百斤)活鸡，仅值港币40元；每担花生油，仅值港币20元；每担尤鱼，价值港币65元；每担白糖，价值港

币 15 元。北海土货如此价廉物美，自然吸引外商。此时，香港的工业发展很快，但由于土地狭小，资源缺乏，不仅生活资料需要依赖进口，而且工业原料也依靠内地和国外供应。由北海出口的传统产品，已占领香港部分市场。从 1931 年起，由于陈济棠实行高筑关税壁垒的策略，故洋货进口减少。与此相反，进口货物受到优惠税的鼓励，保障了地方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地位，客观上刺激了地方商品经济的发展，结果促使北海港对外贸易由入超变出超。请看下列表：

陈济棠主粤时期北海外贸统计表

(1929——1936 年)

单位：万元(洋银)

年 份	洋货进口	国产货入口	土货出口	土货转口	贸易总值	税收(海关)
1929年	149	113	162	(缺)	423	1 8
1930年	210	246	231	(缺)	686	31
1931年	182	206	241	(缺)	629	32
1932年	251	320	201	60	771	59
1933年	336	300	438	1 90	1 264	84
1934年	160	360	354	350	1224	59
1935年	141	280	300	200	921	49
1936年	67	260	148	160	635	37
合计	I, 496	2,085	2,07 5	9,60	6553	366

从表中可以看出，这八年期间，北海港国产货进口总值为 2085 万元，洋货进口总值只有 1496 万元，国产货已在北海市场占优势。与此同时，北海港土货出口和转口总值为 3035 万元，为洋货进口总值一倍以上。据《广东经济年鉴(1940 年)》记载，1933 年北海港土货出口(含转口)总值为 628 万元(洋银)，居全国沿海商埠第十位。由上反映出，陈济棠主粤时期北海对外贸易已由入超变为出超。另外，此时广东省政府在北海港获得关税收入为 366 万元。而 1921 年至 1928 年的关税收入只有 97 万元，后八年比前八年增加 2.8 倍。对外贸易的增长，以及税收的增加，从侧面说明了经济的好转。

然而，好转之象，为时未多。陈济棠的统治毕竟是军阀统治，其采取开放措施，发展经济的出发点是为了解决军费，而不是完全为了国富民强。“出口贸

易理应受鼓励而趋蓬勃，无如内地捐税繁重，连年战事频仍，逐使生产受阻。”

(14)因而，北海外贸从1935年又开始下降。加上，广西内地盗匪横行，运输不易，出口货成本加重，“纵欲与他国产品角逐于市场上，终亦难操胜算矣”。(15)

帝国主义是不允许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，他们一方面加紧对北海土产的掠夺，通过囤积居奇，贱买贵卖，获取高额垄断利润；另一方面亦疯狂地在此推销商品，排斥北海口岸及其内地工业的发展，从中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。兼时值旧中国军阀混战，政局动荡，港口大权没法真正收回，北海关仍由洋人操纵，为外国侵略者仍大开方便之门。加上，北海口岸及内地工业基础薄弱，产品难以对外竞争。1936年7月，陈济棠倒蒋失败下野后，他的开放措施以失败告终，当地经济一度繁荣的景象已成为昙花一现，稍有喜色的北海对外贸易又停滞不前。不久，日本侵华，北海埠惨遭日军铁蹄蹂躏。此后，直至1949年，北海港对外贸易再没有象样的发展。

文献参考

- (1) 《中华民国廿三年通商海关华洋贸易全年总册总论》上卷第70页
- (2)、(12) 《民国廿二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》卷一 第57页
- (3)、(8) 《中国海关民国十八年华洋贸易总册》上卷第95至97页
- (4)、(5)、(6)、(9) 《中国海关民国十九年华洋贸易总册》上卷 第60至61页
- (7)、(13)、(14) 《民国十一年至民国廿年最近十年各埠海关报告》下卷 第320至360页
- (10) 《中国海关民国廿年华洋贸易总册》上卷第58至59页
- (11) 《中国海关民国廿一年华洋贸易总册》上卷第56页